



宏大叙事的毒瘾



华夏全媒体
主管主办
华夏早报社出版
国际标准刊号
ISSN2521-0289

社会会
方智平 江 单 李 青

编委会
江 单 李 青 张邦毛
董 哲 梅任重

专家委员会
李 凌 李增勇 张华勇
龚德贤 黄 浩 朱文强

顾问 | 方智平 邓 飞
名誉社长 | 李克炎
社长、总编辑 | 江 单
常务副总编辑 | 李 青
副社长 | 钱正云 张存猛
副总编辑 | 周应文 董哲

采访中心
主任 | 董 哲 (兼)

编辑中心

主任 | 罗 阳

评论新闻中心

主任 | 张 颖

经济新闻中心

主任 | 龙 腾

区域新闻中心

主任 | 潘利求

文旅新闻中心

主任 | 黄道华

群众工作中心 (内参部)

主任 | 张学江

国际新闻中心

主任 | 黄 浩 (兼)

融媒体中心

主任 | 金 松

新闻影像中心

主任 | 罗明荣

经营中心

副总监 | 严明川

品牌战略中心

主任 | 骆 闻

先锋文化出版中心

总编辑 | 唐吉民

营商环境研究中心

主任 | 黄开莹

副刊编辑中心 / 《思想者》

编辑部

主任 | 艾华林

思想者电台

主编 | 郭园

驻境外记者

驻澳门记者 | 王 强

驻台北记者 | 黄昭蓉

驻东京记者 | 向建国

驻新加坡记者 | 毛周

驻新德里记者 | 黄朝

驻阿拉木图记者 | 周璐

驻耶路撒冷记者 | 贺友

驻加州记者 | 黄 浩

驻开罗记者 | 吴志刚

驻莫斯科记者 | 朱可夫

驻奥斯陆记者 | 向建军

驻伦敦记者 | 邓联辉

驻巴黎记者 | 卢伟平

驻巴西利亚记者 | 尹志强

驻堪培拉记者 | 欧阳子

当历史的聚光灯一次次投向庙堂之高，当集体记忆被简化为帝王将相的英雄谱系，一种诡异的思维病毒便悄然蔓延。

那些在现实中为生计奔波的苦逼们，竟能在精神的平行宇宙中，将自己代入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的角色，在虚拟的权谋疆场上挥斥方遒。

这种跨越千年的身份错位，非但不是精神胜利，反倒成为一剂，让个体在现实泥淖中越陷越深的慢性毒药。对宏大叙事的病态沉溺，首先是一种认知上的自我阉割。它将复杂多维的历史，蒸馏成粗糙的线性剧本：强盛、屈辱、复兴。个体在其中，不再是拥有独特生命体验与利益诉求的主体，而被迫降格，为历史洪

流中一粒没有面目的尘埃，一座没有碑文的丰碑。

当“贞观之治”被简化为万国来朝的盛世图景，便无人再问，那辉煌的宫殿基座下，是多少“贞观子民”被征发的劳役，被压榨的粟米。当“安史之乱”被叙述为王朝命运的转折点，乱世中，人为刍狗的普通血泪便被宏大的叙事逻辑，轻轻抹去。

这种代入，本质是精神上的一次自我献祭，献祭掉对自身具体处境的感知力与反思力，换取一种虚妄的与伟大相连的归属幻觉。

更可悲的是，这种虚幻的归属感，往往沦为现实无能的遮羞布与麻醉剂。当一个人将大量心智带宽耗费在操心，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或“XXX 亡我之

心不死”上，他很可能无力也无心去审视自身生活，真正的困境：那令人窒息的房贷，职场中隐形的天花板，子女教育的内卷困局，家人健康所需的保障缺失。

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情感出口，将个人处境的局促与无力，巧妙地转化为对外部威胁的同仇敌忾，或对“昔日荣光”的精神回流。愤怒与激情有了方向，却完美避开了那些近在咫尺，真正需要理性与勇气去直面的生存课题。于是在虚拟的“为国接盘”的悲壮中，个体悄然完成了对自身发展权的缴械。

这种思维，若任其滋长，将孕育一种危险的社会无意识。一个健康的社会，固然需要共同体层面的理想与叙事，但其根基，必在于

无数鲜活个体对幸福、尊严与发展的正当追求。

当底层民众习惯了用“我们”代替“我”，用“将来”逃避“现在”，用“抽象的敌人”解释

“具体的挫折”，其结果便是社会批判能力的集体退化，与公共理性的荒漠化。

社会矛盾被转移，结构性问题被掩盖，改良与进步所需的微观动力被悄然抽空。最终，金字塔尖的宏大叙事越是响亮夺目，塔基的结构性失语与脆弱便越是积重难返。

鲁迅曾言：“无尽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”这种关切，是推己及人的人文胸怀。但若“都和我有关”变成了“唯独我无关”，当对“无尽远方”的臆想，遮蔽了对脚下

之路的审视，这种情怀便异化成精神的鸦片。

清醒的个体，当首先成为自身生活的第一责任人。在历史的宏大交响中，听清并奏响属于自己生命的独特音符。唯有当无数个体挣脱虚幻的身份代入，脚踏实地地争取并捍卫自身及家人的尊严、权利与幸福，由无数真实坚实的“小时代”凝聚而成的，才可能是一个不被宏大幻象所绑架的、有血有肉的“大时代”。否则，任何缺乏个体福祉根基的宏大叙事，无论其辞藻多么华丽，都不过是悬浮于空中的楼阁，随时可能坠入历史的虚无。

■抖音号 科学与真相

清末为什么只强调丧权辱国，不提人间疾苦？

清末为什么只强调丧权辱国，不提人间疾苦？因为如果不强调丧权辱国，如果不把这个宏大叙事立起来，清政府就无法解释一个核心悖论：为什么闹祸的是朝廷，买单的却是老百姓？

所谓的丧权辱国，本质上是一场最高级别的概念置换和责任转移。我们不妨深究一下，既丧掉了谁的权，又辱没了谁的国。

第一，百姓本无寸权，何来丧权之谓？所谓的丧权，罗列的无非是关税自主权、领事裁判权、驻兵权、筑路权，而对于清末那个在黄土地里刨食、衣不蔽体的老百姓而言，这些权利何曾真正属于过他？

关税权是户部敛财的工具，裁判权是衙门的生杀特权，驻兵权是八旗营的辖制利器，这些从来都不是底层民众的生存凭依，而是清廷皇族、满朝文武、地主士绅对天下的独家垄断，是他们欲取欲求的征税权、生杀予夺的审判权、辖制四方的管理权。

那个时代的百姓，对内无参政议政之途，对外无公民庇护之实，

在统治者的眼里，不过是草民蚁民，是供其驱使榨取的资源。从未拥有过的东西，谈何丧失？

真正丧权的是爱新觉罗的皇权垄断，是满朝官员的特权红利，是地主士绅的既得利益。以前唯有县太爷能打你板子、收你粮草，如今洋人来了，分走了他们的垄断蛋糕，这才是统治阶级口中“丧权”的真相——把自身特权的受损包装成全民的损失。

第二，百姓久遭凌辱，谈何辱国之耻？慈禧西逃的仓皇，圆明园被焚的火光，官员给洋人作揖磕头的卑微，固然是奇耻大辱，但这辱的是皇家的体面，是朝廷的威严，与底层百姓的生存毫无干系。

对于终年劳作却难以饱腹的百姓而言，尊严早就被本国统治者碾在了脚下。见官需下跪，受辱无声诉。灾荒年间，易子而食；苛政之下，流离失所。

他们的屈辱，是被衙役像牲口一样驱赶的日常，是被苛捐杂税最后榨干一丝血汗的绝望，是在皇权高压之下连呼吸都需要小心翼翼

的卑微。

当一个人的尊严早被自己的统治者踩在泥里，摩擦千百遍，头上就算再踩上洋人的脚，那于他而言，不过是换了一个压迫者而已，苦难的本质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。

之所以不提民间疾苦，是因为疾苦本就是清廷统治的“出厂设置”。苛政猛于虎，腐败烂于根，民不聊生是常态。若强调民间疾苦，矛头就会直指清廷的腐朽无能，动摇其统治的合法性；而渲染“辱国”，则能将内部矛盾成功转向外部列强，让百姓的怨恨有了新的宣泄口。

第三，为何要把“丧权辱国”喊得震天响？核心逻辑就一个：让百姓买单。清廷战败签约，《马关条约》二亿两赔款，《辛丑条约》四亿五千万两赔款，这笔天文数字的债务，绝不会从统治者的口袋里掏。官员不会捐出家产，慈禧不会把一餐六十道菜的预算改为六道，他们依旧身居高位，坐拥财富与特权。

那所有的赔款最终都化作了田赋、厘金、苛捐杂税，层层转嫁到了劳动人民的身上，变

成了百姓的卖儿卖女、流离失所。

若不构建“丧权辱国”的宏大叙事，百姓只会清醒地质问：这是爱新觉罗家欠了洋人的债，是李鸿章签的字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凭什么让我来倾家荡产地还？可一旦扣上了“民族苦难、全民耻辱”的帽子，逻辑就完成了偷换——这不再是朝廷的烂账，而是整个民族的劫难；这不再是统治者的失责，而是全体国人的奇耻。

通过这种概念捆绑，统治者成功地给百姓洗脑：即便你从未享受过国家的权力，从未得到过朝廷的庇护，也必须承担国家的债务，为统治者的失误买单。

为何当年百姓会给八国联军扶梯子、运粮草？答案就藏在最朴素的生存逻辑里。在百姓的心中，大清朝廷从来都不是“我的国”，而是骑在我头上的主子，是敲骨吸髓的仇人。

平日里，统治者视民如草芥，防民胜于防川，把百姓当做压榨的工具、维稳的对象。等到洋人打过来了，突然想起来“我需要炮灰了”，便说“老百姓

是同胞，要他们为国捐躯”。天下从无此等便宜事。百姓的善恶观是最纯粹的：谁压榨我，我就恨谁；谁给我一线生机，我便依附于谁。他们不是帮洋人，而是反抗那个让他们活不下去的暴政；他们背弃的不是国家，而是那个从未将他们当做子民的清廷。

民间疾苦是清廷统治的原罪，提多了，其合法性便会土崩瓦解；“丧权辱国”是外部强加的标签，提多了，内部矛盾便会转为外部冲突。这场精心构建的叙事，掩盖了一个残酷到令人窒息的真相。

在那段黑暗的历史里，真正的受害者，从来都是底层百姓。他们既没有享受过“权”，也没有资格谈“国”，却实实在在地承担了所有的苦、所有的债、所有的屈辱。所谓的“丧权辱国”的宏大叙事，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自保，将自身的统治危机转化为全民的生存劫难罢了。

■抖音号 梓钧

